

贬谪时期的柳宗元研究

Bianzhe shiqide

Liu Zongyuan

yanjiu

◎ 龚玉兰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贬谪时期的柳宗元研究

Bianzhe shiqi de

Liu Zongyuan

yanjiu

◎ 龚玉兰 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贬谪时期的柳宗元研究 / 龚玉兰著. —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 2010.12
ISBN 978-7-5506-0053-9

I. ①贬… II. ①龚… III. ①柳宗元 (773~819) — 人物研究②柳宗元 (773~819) — 文学研究 IV.
①K825.6②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64433号

书 名 贬谪时期的柳宗元研究

著 者 龚玉兰

责任编辑 卞 岐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

发行部电话 025—83223462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

南京浦口大桥北路京新村 546 号 邮编:210031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25

字 数 230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06-0053-9

定 价 25.00 元

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 电话: 025—58849828)

引言

柳宗元(773—819),字子厚,祖籍唐蒲州解县,古属河东郡,故柳宗元被称为“柳河东”。他的父亲柳镇淡然处世、耿直中正、关心民生、秉公执法、不徇私情^①,曾任殿中侍御史,因参与审理已故陕虢观察使卢岳妻妾继承遗产案件,得罪权奸窦参,后被贬为夔州(今四川奉节县)司马。后窦参得罪贬死,柳镇才得以平反昭雪,官复原职。从柳宗元家庭情况来看,他受父亲人格影响很大,尤其是父亲的贬谪经历给他以很大触动。柳宗元自视很高,胸怀大志,这也成为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,被一贬再贬后绝无悔意的精神动力。

柳宗元贞元九年(793)年考中进士,与其同榜的有他的至交好友刘禹锡。贞元十四年(796)柳宗元登博学宏词科,受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字。虽说此官职不高,主要整理图书经籍,但却是唐代文士官职晋升的捷径。三年期满后,调补京兆府蓝田(今陕西蓝田)县尉,亲眼目睹了当地官吏巧取豪夺的丑恶面目,更坚定了其励精图治,革除社会弊病的决心。贞元十九年(803),受人推荐,柳宗元入朝任监察御史里行。虽然官位不高,却颇受朝廷重视,也为日后的仕途通达奠定了基础。贞元二十一年(805)正月,德宗李适病亡,王叔文等人拥立太子李诵即位,当时李诵中风失语,宫廷斗争异常尖锐。之后,柳宗元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,官阶晋升很快,加上其个性张扬,引起了朝中人的嫉妒以及不满。

^① 见《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》,《柳宗元集》卷一二。

刘禹锡等革新派人士也都被委以重任。客观地说，革新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韩愈在《顺宗实录》中有所记载。之后，革新派在朝廷内部斗争中处于劣势。七月二十八日，皇太子李纯监国，在宦官的支持下采取各种措施不遗余力地打击革新派。八月四日，顺宗禅位，革新派失去了最后、最有力的权力支柱。八月五日，改元永贞，八月六日，朝廷对“二王、刘柳”集团中的“二王”首开惩罚，贬谪“二王”为远州司马，其中贬王伾为开州（今四川开县）司马，王叔文为渝州（今四川重庆）司马。八月九日，李纯即位，标志着革新派运动的彻底失败。九月十三日，革新派人士全部被贬为远州刺史，其中柳宗元被贬为邵州（今湖南邵州）刺史，刘禹锡被贬为连州（今广东连县）刺史。九月十四日，朝议认为王叔文之集团被贬官太轻，加贬为远州司马，柳宗元又被贬为永州（今湖南永州）司马，刘禹锡被贬为朗州（今湖南常德）司马^①。唐宪宗即位后，颇有作为，相继平定了不少地方割据势力的叛乱，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中央政权，柳宗元在远州僻壤闻之，欢欣鼓舞，写了不少祝贺之辞，希冀朝廷启用。元和元年（806），王叔文被赐死于贬所，王伾亦早病死。朝廷对“八司马”的打击从头至尾十分严厉，在朝廷的几次大赦中，均下诏说：“左降官韦执谊、韩泰、陈谏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韩晔、凌准、程异等八人，纵逢恩赦，不在量移之限。”^②这样就彻底打碎了柳宗元、刘禹锡等人希望朝廷重视人才，重新启用他们的梦想。

革新派人士被驱逐出中央，贬谪到荒远之地后，朝廷中讥讽之声不绝于耳，跟刘柳等人交往的除了一些至交好友外，他们都基本处于长期的孤独和郁闷中。元和十年，朝廷正是用人之际，遂将王叔文之党被贬官者全部诏入京师，“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，凡十年不量移，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，悉召至京师”^③。柳宗元等人闻之，异常兴奋，作了不少意气风发、重见天日的诗歌。如柳宗元的《过衡山见新花开却寄弟》，此

① 《唐才子传》根据新旧《唐书》所载，言简意赅云：“（柳）与王叔文、韦执谊善，二人引之谋事。擢礼部员外郎。欲大用，值叔文败，贬邵州刺史，半道有诏，贬永州司马。”见《唐才子传校笺》，第465—466页。

② 《旧唐书》卷一四《宪宗纪》。

③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三九“元和十年”。

诗写给尚在永州的从弟宗直，用“发南枝”、“晴天”等意象表达自己欣喜若狂的心情，诗曰：

故国名园久别离，今朝楚树发南枝。晴天归路好相逐，正是峰前回雁时。^①

《汨罗遇风》诗歌不但一扫柳宗元贬谪于永州时的阴霾心理，表达了自己北归的欢乐心境，而且重申了自身期待有更好作为的理想，诗云：

南来不作楚臣悲，重入修门自有期。为报春风汨罗道，莫将波浪枉明时。^②

而《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》诗浅显易懂，用路途的花开处处新，凸显自己从边远之地回京城的愉悦之情，诗曰：

十一年前南渡客，四千里外北归人。诏书许逐阳和至，驿路开花处处新。^③

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刘柳等人想象的那样，他们的诏回经历十分短暂。元和朝的朝廷斗争更加复杂。虽然唐宪宗将王叔文余党皆招回，但是发现这些人并无丝毫的悔意，如个性倔强，被称为“诗豪”的刘禹锡曾在《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》中说：“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。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^④这首诗对当朝的显贵明显带有讽刺意味，显示了刘禹锡“恃才而放，心不能平”^⑤的特点。其实，这又何尝不是柳宗元等人的心声？只不过柳宗元内敛的性格使他没有像刘禹锡这么豪放直接表述罢了。革新派激进直接的态度引起了当政者的反感，元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，他们再次出离中央，被任命为远州刺史，官虽进而地益远，其实是明升暗降之法，惩处更加严厉，柳宗元被贬为柳州（今广西柳州）刺史，刘禹锡被贬为播州（今贵州遵义）刺史。由此可见，朝廷对革新派始终存有猜忌、戒备之心。当

^{①②③}《柳宗元集》卷四二。

^④《刘禹锡集》卷二四。

^⑤《唐才子传校笺》，第 500 页。

时,刘禹锡母亲年事已高,八十多岁的老人跟着儿子去播州,恐路途遥远,环境艰苦,凶多吉少,柳宗元出于对好友的爱护,准备拿柳州和其调换。幸而裴度等人的说情,朝廷才改刘禹锡任连州刺史。刘柳这段患难与共、为对方着想的真情成为文坛佳话。

柳宗元在永州、柳州生活了十四年后,由于水土不服,气候不适应,贫病交加,心情忧郁、焦虑,于元和十四年(819)十一月八日终于柳州,年47岁。

柳宗元历经代、德、顺、宪四朝,处于中唐各种矛盾激化的复杂环境之中,他积极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,虽然屡遭政治打击,被贬谪至僻远之地,却不因此而退缩与后悔,体现了政治上的激进和坚韧。同时,柳在贬谪地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高峰,被后人所推崇。可以说,政治上的失意成就了其文学的繁荣,“公天才绝伦,文章卓伟,一时辈行,咸推仰之。工诗,语意深切,发纤秾于简古,寄至味于淡泊,非余子所及也”^①。另外,由于其长期担任地方官,十分关注民生,采取了不少有利于民风革新、促进生产的措施,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爱戴,“宗元在柳,多惠政。及卒,百姓追慕,至祠享祀,血食至今”^②。

本书将从柳宗元的思想与心态、柳宗元的文学思想与成就、柳宗元的评价与影响三个方面进行探讨。

①《唐才子传校笺》,第470—471页。

②《唐才子传校笺》,第468页。

目 录

引 言	1
第一章	
永贞革新前后文士的政治心态	1
第二章	
柳宗元的儒释道兼容思想	12
第三章	
柳宗元的《天对》、《天说》思想.....	41
第四章	
柳宗元的民本思想	51
第五章	
柳宗元贬谪时期的文学创作心态	63

第六章

- 柳宗元的贬谪文学研究 89

第七章

- 柳宗元的愚性情结与渔翁情结 181

第八章

- 柳子厚墓志铭以及祭文研究 196

第九章

- 柳宗元的接受与传播 210

结 论

- 贬谪时期的柳宗元的总体评价 240

附 录

- 引用及参考书目 244

- 后 记 257

第一章

永贞革新前后文士的政治心态

第一节 时人对柳宗元政治态度的评价

柳宗元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，因为他参加了王叔文集团的永贞革新运动而被一贬再贬，时人及后人对其多有微词，指责他和刘禹锡等人在政治上意图速进，而依附于王叔文等“小人”。这种看法并非产生于革新运动失败之后，而是产生于革新运动之中，在“二王、刘、柳”当权时，朝廷中就有人公开表示“吾不能事新贵”^①，侍御史窦群更攻击刘禹锡“挟邪乱政，不宜在朝”^②。和柳宗元同时代的韩愈、白居易等士大夫又是如何看待他的呢？

韩愈对柳宗元积极参与革新的态度持完全否定的态度，他认为这些革新派人物是“有当时名，欲侥幸而速进者”^③。《柳子厚墓志铭》中亦云：“前时少年，勇于为人，不自贵重顾藉，谓功业可立就，故坐废退”^④。这里，韩愈将柳宗元等人招致贬谪之祸归咎于盲目追求功名。

① 《新唐书》卷一二六《韩皋传》。

② 《旧唐书》卷一六〇《刘禹锡传》。

③ 《全唐文》卷五六〇《顺宗实录》卷五。

④ 《全唐文》卷五六三《柳子厚墓志铭》。

韩愈的这种看法源于他对永贞革新的不满情绪，这种不满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是贞元末，他本与刘禹锡、柳宗元同为监察御史，但却被贬官。二是他对革新运动中暴露出的贿赂、结党等弊病非常反感和痛恨。关于韩愈贬官的原因，学界多有分析研究^①，意见大相径庭，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隐约感觉到其内心的疑虑，其诗《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》云：“同官尽才俊，偏善柳和刘。或虑语言泄，传之落冤仇。二子不宜尔，将疑断还不。”^②其中也许有怀疑刘、柳的因素，他们可能把韩愈所言的不满之词无意中泄露出去，从而使韩受到“冤仇”的打击，这里的“怨仇”概指王党。韩愈一直视王叔文等人为“小人”，对革新派结党营私、仕途飞升、公然受贿、压制同僚等作为很愤慨，但他与刘、柳交好，对两人的品行是肯定的，只是对他们依附“小人”而有所批评，对他们被贬谪南荒的命运也很同情，规劝要以此为戒，其《永贞行》^③曰：“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，小人乘时偷国柄”、“一朝夺印付私党，凛凛朝士何能为”、“夜作诏书朝拜官，超资越序曾无难”、“公然白日受贿赂，火齐磊落堆金盘”、“元臣故老不敢语，昼卧涕泣何汎澜”、“具书目见非妄征，嗟尔既往宜为惩”。在他被召回京的《忆昨行和张十一》诗中曰：“伾、文未揅崖州炽，虽得赦宥恒愁猜。近者三奸悉破碎，羽窟无底幽黄能。眼中了了见乡国，知有归日眉方开。”^④“三奸”是指王伾、王叔文、韦执谊，韩愈认为自己的贬谪遭遇是“三奸”所为。可见，韩愈对永贞革新是持否定态度的，而他对时事的看法有时处于猜疑之中，这种思想亦深刻体现在他所撰写的《顺宗实录》中，如其卷五曰：

有与之（张正买）不善者，告叔文、执谊云：“正买疏似论君朋党事，宜少诫。”执谊、叔文信之。执谊尝为翰林学士，父死罢官，此时虽为散郎，以恩时时召入问外事，执谊因言成季等朋宴聚游无度，

^① 黄云眉分析认为，韩愈贬为阳山令不应归罪于柳宗元。参见《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》，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。新、旧《唐书》则谓他因上疏论宫市而获罪，《资治通鉴》归之于其上《论天旱人饥状》所致，至今尚无定论。

^{②③} 韩愈撰、钱仲联集释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》卷三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。

^④ 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》卷四。

皆谴责之，人莫知其由。^①

韩愈推测张正买被谴责之事是由于韦执谊的谗毁所致。而他自己亦认为史官记录史事须谨慎，不可随意褒贬，其《答刘秀才论史书》^②云：“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，春秋已备之矣，后之作者，在据事迹实录，则善恶自见。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，况褒贬耶？”“夫为史者，不有人祸，则有天刑”、“传闻不同，善恶随人所见，甚者附党。憎爱不同，巧造语言，凿空构立，善恶事迹，于今何所承受取信，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？若无鬼神，岂可不自心惭愧？若有鬼神，将不福人。仆虽駁，亦粗知自爱，实不敢率尔为也？”在向朝廷呈献《顺宗实录》时，他上《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》云：“消去常事，著其系于政者，比之旧录，十益六七。忠良奸佞，莫不备书，苟关于时，无所不录。”^③这和《顺宗实录》中疑则传疑的态度似乎很矛盾，但反映了史书记载中存在的问题，史官个人的好恶因素或多或少会有所体现，那么他对革新派人物的贬责就不足为怪了。而柳宗元则不然，他对韩愈的史官才能是肯定的，但对韩愈所说的史官“不有人祸，则有天刑”的观点是完全否定的，他认为：“史以名为褒贬，犹且恐惧不敢为；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，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，其宜恐惧尤大也”、“今学如退之，辞如退之，好议论如退之，慷慨自谓正直行为焉如退之，犹所云若是，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？”^④尽管韩愈为史官，有所畏惧，但他的《顺宗实录》的确达到了柳宗元所说的褒贬之义的。

和韩愈的贬责态度明显不同，与刘、柳交好的白居易对永贞革新是支持的。还在革新派当政之时，他曾给韦执谊上书数千言陈述为相之见，鼓励其革新，曰：

古者圣贤，有其才无其位，不能行其道也。有其才有其位，无其时，亦不能行其道也。必待有其才，有其位，有其时，然后能行

^① 《全唐文》卷五六〇。

^② 《全唐文》卷五五四。

^③ 《全唐文》卷五四七。

^④ 《柳宗元集》卷三一《与韩愈论史官书》。

其道焉。某窃见相公囊时制策对中，论风化浇淳之源，明天人交感之道，陈兵灾救疗之术，可谓有其才矣。又伏见今月十一日制词云：“其代予言，允属良弼，必能形四方之风，成天下之务。”可谓有其时矣。今相公有其才，有其位，有其时，则行道由已，而由道乎哉？^①

此文又云：“相公充人望，代天工，报国之恩，正在于今日矣。”从中可知，他热情高涨，把祛除时弊、改革政治的满腔希望寄托在革新派人物身上。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，白居易《新乐府》中的《太行路》、《陵园妾》等诗，都是有感于永贞革新被贬谪的人而作的。陈分析《太行路》说：

韦执谊流贬于宪宗即位之年，距乐天作诗之时甚近。乐天始终同情于牛僧孺，而牛僧孺曾受韦执谊之知奖。复考《白氏长庆集》二七有《为人上宰相书》一篇，据其中所言此宰相拜相之日，知必为韦执谊无疑。然则韦执谊虽未赐死，但其进退荣辱，易致乐天之感触，自甚明也。乐天此篇之作，或竟为近慨崖州之沉沦，追刺德宗之猜刻，遂取以讽谏元和天子耶？^②

白居易的《陵园妾》叙述了宫女幽闭之情事，陈寅恪亦认为：“乐天此篇所寄慨者，其永贞元年窜逐之八司马乎？”“则以随丰陵葬礼，幽闭山宫，长不令出之嫔妾。喻随永贞内禅，窜逐远州，永不量移之朝臣。实一切合也。惟八司马最为宪宗所恶，乐天不敢明以丰陵为言。复借被谗遭黜之意，以变易其辞，遂不易为后人觉察耳。”^③这些论证虽不很确定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白居易对永贞革新的同情态度。他对社会是有所不满的，积极要求革新的，但朝廷内部激烈的竞争，促使他远祸而遁逃到佛教中去了。

白居易的好友元稹，个性耿直，对宦官干政极其反感，其在永贞时期官位不高，并未参与革新运动，但他和刘柳的关系一直很密切，从这

① 白居易撰、顾学颉校点《白居易集》卷四四《为人上宰相书》，中华书局1979年版。

② 陈寅恪《元白诗笺证稿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新1版，第177—178页。

③ 陈寅恪《元白诗笺证稿》，第269页。

个角度而言，他对永贞革新派的态度还是积极的。我们亦可以从元稹的仕途沉浮中窥见其政治倾向，元稹之后也曾弹劾过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以及浙东观察使韩皋。元和五年，元稹因为直言不讳，得罪权贵，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。由于该地与柳宗元、刘禹锡的贬谪之地比较接近，彼此有酬唱，加上和吕温、李景俭等人都有交往，更加印证了他对革新派同情的态度^①。

韩愈、元白的态度代表了士子们对革新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，而他们都是局外人。那么参与革新派的中坚人物对此是如何看待的呢？这里以柳宗元的好友刘禹锡为例。刘禹锡认为柳宗元被贬谪是因为“疏慵少检”^②。而刘禹锡自己在革新失败后也备受谣言的攻击，其《上杜司徒书》云：“吠声者多，辨实者寡。飞语一发，胪言四驰。”^③但刘禹锡并不畏惧，在贬谪时期，他依然为自己参与革新运动作辩解，在《谢上连州刺史表》中认为“出身入仕，并不因人”、“权臣奏用，盖闻虚名，实非曲求”、“臣有微才，所以嫉臣者众，竞生口语，广肆加诬”^④，《苏州谢上表》亦云：“臣本书生，素无党援”、“永贞之初，权臣领务。遂奏录用，盖闻虚名。唯守职业，实无朋附。竟坐飞语，贬在遐藩。”^⑤虽然他一贬再贬，却能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：“世道剧颓波，我心如砥柱。”^⑥刘禹锡虽然称王叔文等人为“权臣”，但并不贬低他们，《子刘子自传》^⑦云：“贞元二十一年春，德宗新弃天下，东宫即位。时有寒隽王叔文以善弈棋得通籍博望，因间隙得言及时事，上大奇之。”“叔文，北海人，自言猛之后，有远祖风，唯东平吕温、陇西李景俭、河东柳宗元以为信然。三子者，皆与予厚善，日夕过，言其能。叔文实工言治道，能以口辩移人。即得用，自

^① 参见蹇长春《白居易评传》第二章，第 87 页。

^② 刘禹锡撰、瞿蜕园校点《刘禹锡全集》卷一九《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。

^③ 刘禹锡撰、瞿蜕园校点《刘禹锡全集》卷一〇。

^④ 刘禹锡撰、瞿蜕园校点《刘禹锡全集》外集卷九。

^⑤ 刘禹锡撰、瞿蜕园校点《刘禹锡全集》卷一五。

^⑥ 刘禹锡撰、瞿蜕园校点《刘禹锡全集》卷二一《咏史二首》其一。

^⑦ 刘禹锡撰、瞿蜕园校点《刘禹锡全集》外集卷九。

春至秋，其所施为，人不以为当非。”这里，刘禹锡对王叔文的才能是称赏的。而“宫掖事秘，而建桓立顺，功归贵臣。于是叔文首贬渝州，后命终死”，刘禹锡虽然隐约其词，但还是指出内禅为宦官所为之事，且他对王叔文之死在平静叙述之中亦有惋惜之情。正因为他对永贞革新的肯定，《自传》末尾的铭文中才有“人或加讪，心无疵兮”的决心。

永贞革新失败了，时人及后人对这次革新运动或褒或贬^①，且贬责之词居多。褒奖多集中在革新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许多时弊这一基点上，而否定者则认为王叔文等人只是一朝得势的“小人”，刘禹锡、柳宗元等有才之士不过是为求速进而附和之，从“小人”之革新，结党、受贿等现象就滋生了。革新派人士刘禹锡对此说却不以为然，他对王叔文等人的品行始终无异议，对参与革新之事也始终无后悔之意，作为刘禹锡的挚友，柳宗元的态度也非常值得研究。

第二节 柳宗元革新前后的政治心态

研究柳宗元的政治心态，首先得考察王叔文其人，他是否是急功近利的权臣和巧言善辩的小人？刘禹锡认为他是“权臣”，虽略微有些贬义，却别无批评之辞。《旧唐书》认为刘禹锡、柳宗元“蹈道不谨，昵比小人，自致流离，遂隳素业”^②。《新唐书》云：“叔文沾沾小人，窃天下柄，与阳虎取大弓，《春秋》书为盗无以异。宗元等挠节从之，徼幸一时，贪帝病昏，抑太子之明，规权逐私，故贤者疾，不肖者媚。一偾而不复，宜哉！彼若不传匪人，自励材猷，不失为名卿才大夫，惜哉！”^③两唐书对王叔文的评价都是“小人”，指责其窃取了朝廷重权，而结党营私。《顺宗实录》亦贬低王伾、王叔文等人，曰：

叔文，越州人，以棋入东宫，颇自言读书知理道。乘间尝言人

① 参见孙昌武《柳宗元评传》第二章，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，第 82—84 页。

② 《旧唐书》卷一六〇。

③ 《新唐书》卷一六八。

间疾苦。上将大论官市事，叔文说中上意，遂有宠。因为上言：“某可为将，某可为相，幸异日用之。”密结韦执谊，并有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者陆质、吕温、李景俭、韩晔、韩泰、陈谏、刘禹锡、柳宗元等十数人，定为死交。而凌准、程异等又因其党而进。交游踪迹诡秘，莫有知其端者。^①

此《实录》又云：“伾以侍书幸，寝陋吴语，上所亵狎。而叔文颇任事，自许微知文义，好言事，上以故稍敬之，不得如伾出入无阻。”这里，揭示了王叔文、王伾出身卑微，皆由娱乐身份而受宠，进而秘密结党之事，其中带有贬义，自然就将刘、柳等人视为“求速进者”了。

以上是正统史书对王叔文以及柳宗元等人的一些评价。我们也可以从文士的角度来分析。北宋的苏轼非常推崇柳宗元的诗歌，但却对他参与革新运动并不认同，在《柳子厚论伊尹》中曰：“能用伊尹而得志于天下，虽至愚知其不然，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从王叔文之罪也。”^②又在《柳宗元诞妄》中将柳宗元参与革新与吕恭娶裴延龄之女为妻相提并论，认为：“宗元与伾、叔文为交，盖亦不羞于延龄姻也。”^③此外，还在《续欧阳子朋党论》中说：

凡才智之士，锐于功名而嗜于进取者，随所用耳。孔子曰：“仁者安仁，智者利仁。”未必皆君子也。冉有从夫子则为门人之选，从季氏则为聚敛之臣。唐柳宗元、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，其高才绝学，亦足以为唐名臣矣。^④

由此可见，苏轼是完全否定王伾、王叔文的，并将刘、柳的积极参与认为是求功名心切，而误入“小人”之党。南宋的赵彦卫虽然对永贞革新的某些改革措施比较赞赏，但还是认定王叔文是“小人”，其云：“唐八司马皆天下奇才，岂皆见识卑下而附于叔文？盖叔文虽小人，欲诛宦官、强王室，特计出下下，反为所胜被祸耳。善良皆不免，当时有所拘忌，不得

^① 《全唐文》卷五六〇《顺宗实录》卷五。

^{②③} 苏轼撰、孔凡礼校点《苏轼文集》卷六五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。

^④ 苏轼撰、孔凡礼校点《苏轼文集》卷四。

不深诛而力诋之。”^①金代的王若虚亦云：“柳子厚附丽小人，以得罪天子”^②，“小人”显然是指王叔文等人。

但柳宗元对待王叔文及永贞革新的态度和刘禹锡一样，始终并无贬词。他和王叔文的关系很密切，王叔文对刘、柳亦十分赏识，“引禹锡与柳宗元入禁中，与之图议，言无不从”、“时号二王、刘、柳”^③。即使在革新派处于完全劣势的时候，柳宗元对王叔文的评价亦很高，此可从其《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》^④一文中窥见，文曰：

叔文，坚明直亮，有文武之用。贞元中，待诏禁中，以道合于储后，凡十有八载，献可替否，有匡弼调护之勤。先帝弃万姓，嗣皇承大位。公居禁中，𬣙谟定命，有扶翼经纬之绩，由苏州司功参军，为起居舍人、翰林学士。将明出纳，有弥纶通变之劳，副经邦阜材之职。加户部侍郎，赐紫金鱼带。重轻开塞，有和钩肅给之效。内赞谋画，不废其位，凡执事十四旬有六日。利安之道，将施于人。

此文是柳宗元在革新派已趋于失势，王叔文贬官的前几天为其亡母而作的，其中肯定了王叔文的才能，指出其“坚明直亮，有文武之用”，并赞赏他辅佐顺宗、积极改革所取得的成效。在贬谪之后，他也不认为王叔文是“小人”，只是称其为“负罪者”，《寄许京兆孟容书》云：

宗元早岁，与负罪者亲善，始奇其能，谓可以共立仁义，裨教化。过不自料，勤勤勉励，唯以中正信义为志，以兴尧、舜、孔子之道，利安元元为务，不知愚陋，不可力彊，其素意如此也。^⑤

可见，尽管柳宗元认为自己“于众党人中，罪状最甚”^⑥，但丝毫不影响他对王叔文的才能的肯定，亦对革新运动无任何贬词。清代的王鸣盛在《十七史商榷》中对王叔文有中肯的评价：“叔文行政，上利于国，下利

① 《云麓漫钞》卷一〇，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。

② 《津南遗老集》卷二九，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本。

③ 《旧唐书》卷一六〇《刘禹锡传》。

④⑤ 《柳宗元集》卷一三。

⑥ 《柳宗元集》卷三〇《寄许京兆孟容书》。